

凌家滩遗址:文明起源时代的曙光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境内,为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被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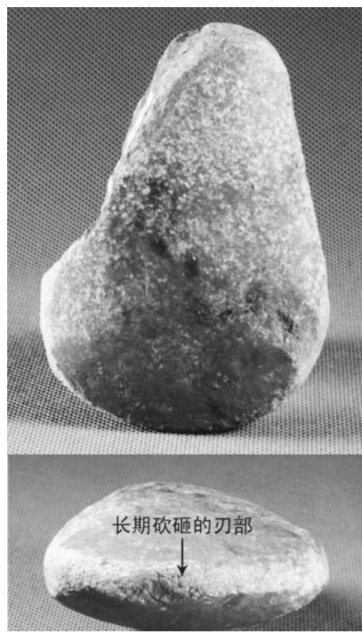
自从1985年发现以来,考古人员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在以往凌家滩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的基础上,2008年至201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对凌家滩遗址再次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钻探、发掘工作。发掘结果证实了凌家滩遗址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等级分明,是一处5000多年前巢湖流域乃至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型区域中心,且在其周边分布着规模不等的数个中小型聚落。不仅如此,凌家滩先民能够制造、拥有大量玉石器,还发展了稻作农业,饲养或捕猎猪、鹿、鸟禽等多种动物。专家认为,这一遗址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周环绕“卫星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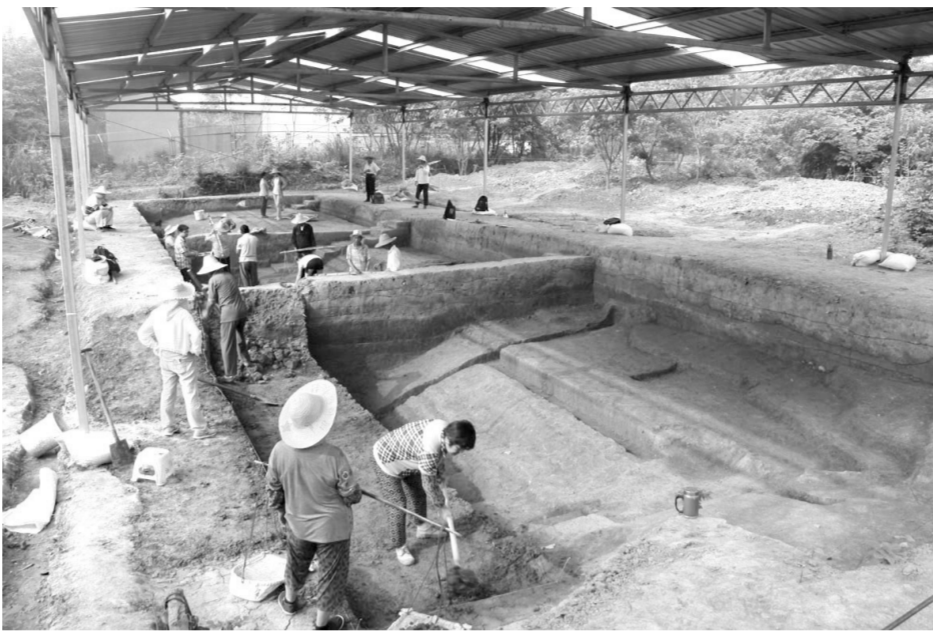
韦岗遗址距凌家滩遗址约2.7公里,是一处凌家滩文化时期的“卫星村”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230平方米。在遗址南侧边缘发现一条沟状堆积,已发掘长约19米、宽约5米的一段,沟内有一条用碎陶片、石块铺成的类似道路的遗迹,长约6.7米、最宽约1.3米。另在沟底发现一批柱洞共有近百个,其功能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出土了凌家滩时期遗物有陶鼎、缸、豆、纺轮、饼、丸等,石器仅有少量残损的斧、釜、凿,但砺石较多。此外,发现不少动物骨骼,包括牙齿、颌骨、鹿角等。其中,道路遗迹和成批柱洞的发现尚属首次,考古专家认为,这填补了凌家滩时期居民生活材料的空白,数量较多的动物骨骼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食物选择的倾向性。

内外两重壕沟:护城河的雏形

内外两重壕沟的发现是此次发掘中的又一亮点。在凌家滩中心聚落遗址外,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条长达2000米,最宽约30米、深2米至6米不等



凌家滩先人用过的石斧



凌家滩遗址发掘现场

的大型环绕壕沟遗址。考古专家认为,5300多年前的凌家滩先民,营建这样的土方量达数十万立方米的大型工程,在全国同时期是屈指可数的。这一大型壕沟是划分居住区与贵族墓地的一道重要界线,居民区集中在壕沟环绕的区域内,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在其外围还有零散居住点。考古专家认为,凌家滩壕沟遗址的发现,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认识上的一种大型公共工程,营建这样的壕沟说明当时社会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实力,而且已具备一定的权力号召和社会动员的组织能力,即具备行政管理能力,迈出了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重要一步。

5000年前的吃住行

住——挖槽填烧土,木骨撑泥墙。此次考古使我们了解到凌家滩先人主要用经火烧过的红烧土块作为房基槽与墙体的填充材料,在基槽内用木棍

作为墙体支撑柱,然后在填充红烧土块的基础上,敷上较厚的粘泥,类似现代钢筋和混凝土,一部分还用芦苇秆加固。

吃——荤素搭配,不再“茹毛饮血”。此次考古发现了红烧土块内有水稻炭化后的稻壳痕,土壤中浮选出了水稻的种子,并发现了较多鸟禽类、猪、鹿等动物骨骼。出土的饮食器具则以锅碗瓢盆数量居多,各种用具均为陶器,如炊煮用的鼎、盛食用的碗、豆、盘,装水的杯、壶,储藏的缸,以及能磨块状食品的刻槽盆等。可以得知,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凌家滩先民已经发展了种植、养殖、打猎等多种经济。

用——生产工具多为石器。凌家滩时期的先民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并能够制造、拥有大量玉石器。他们的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是石质工具,如开荒伐木的石斧、修整木材的石镑、石凿等,收割农作物的石刀,也有磨制这些石器的砺石,以及纺线用的陶纺轮。

当时或已进入“古国”时代

凌家滩文化正处于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上,其文化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众星拱月”的发现,并结合业已发现的大型祭坛、高等级的大型贵族墓葬、大型红烧土建筑,及功能多样、精美绝伦的礼制性玉石器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凌家滩人口的繁盛,中心与周边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

考古专家认为,凌家滩文化在社会组织、贫富分化、玉石器制造等方面都是同期文化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凌家滩遗址中祭坛、大型壕沟等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的发现,显示出其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时代,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消息长廊

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工建设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河北省张北县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元中都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张北县馒头营乡白城子村西南1公里处。据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霍莹介绍,元中都遗址是元朝重要的都城之一,至今在遗址周边地区还有众多蒙古音译地名,现存多个蒙民聚居村落,当地群众在语言、生产方式、节日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还保持着蒙古族的部分传统,这些都是蒙元文化传衍至今的最好见证。霍莹说,“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

计,将以元中都遗址本体为核心,以周边丰富的草原、山水环境为依托,把周边自然景观与遗址景点串联起来,构建元中都遗址生态、文化、景观大格局。”

据了解,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规划建设用地13485亩,总投资3.6亿元。根据《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2013—2030)》,遗址公园内将开发“殿堂风云”“帝国玫瑰”“城头点将”等八大景观。元中都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元中都深厚的文化内涵,有利于遗址保护、展示和开发等。(曹国厂)

社科院举办考古讲座

本报讯(记者杜洁芳)6月29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成果开发中心主办的名家公益大讲堂第一讲“从古代走来——听考古学家讲中国故事”在北京开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从考古发现中探究最初的中国,根据考古线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安阳考古工作站站长唐

际根就殷墟的考古发掘揭示我国历史上商朝的基本面貌,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商人可能是蒙古人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通过中国人最尊崇的玉米探究中国文明史,向大家讲述了美玉里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通过对汉长安城的揭示,向大家讲述了历代王朝都城沿袭汉长安城的基本形制。

天津发现东汉列侯墓葬

本报讯(记者杜洁芳)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近日在蓟县发掘出7座东汉墓葬,其中2号墓室被确认为天津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最高级别的墓葬。

从今年4月份开始,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在蓟县城东小毛庄一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现场清理出26座古墓。包括明清墓葬13座、东汉墓葬7座、西汉墓葬5座、战国时期墓葬1座。其中2号墓室和6号墓室出土陶、铜、漆、玉等质地文物标本200余件,出土文物中彩绘陶器、釉陶器、鎏金铜饰占有较大比重。

此次发掘的东汉时期的墓葬形制不一,规模较大。墓葬2号墓室东西宽12.2米,南北总长(带墓道)28.8米,其带方形回廊的“甲”字形石室墓和墓室中出土的铜绿玉衣残片,以及墓门上画像石的雕刻技法,都可证明该墓葬

为东汉早期列侯等级的墓葬。

据考古专家介绍,7座东汉墓葬的形制各有特点。2号墓室由主室、前室、侧室、方形回廊及墓道组成,为竖穴土坑的砖石结构,方形回廊包圍三室。2号墓室墓葬结构形制独特,是迄今为止天津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最高级别的墓葬,也是目前已知全国唯一使用方形回廊的列侯等级墓葬。

除2号墓外,6号墓为经过多次改建使用的墓葬。在其墓门中,一块石条上刻有“鲁国仪雅文所造作、广阳刘淑度、上尚、田仲”等文字,被认为是修造墓葬的工匠名字。从其提到的鲁国、广阳等籍贯说明,墓葬的修建应该是东汉中央政府召集各郡国工匠所修,此刻石也是天津首次发现带籍贯和人名的东汉刻石。



炭化米粒



陶器

远古时代,人类的四大“发明”

高蒙河

近代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性事件,其最重要的标志是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由此,引来了自古以来人类从手工生产向机械生产方式的重大飞跃,致使欧美等国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如汽车、飞机、电灯、电话、电报、影视、电脑等,不胜枚举。说起来,它们与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的四大发明一样,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交流,对整个文明发展,都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最终实现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伟大变革。

当我们每每津津乐道这些伟大的革命性发明时,是否曾想过,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古代,确切地说是远古时代,我们人类的祖先还有过哪些对古今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的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工业革命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性事件的话,那么第一次革命性事件是什么呢?让我们带着这类问题,用考古的“望远镜”,去看看工业社会以前最初的传统农业社会是以什么为标志所形成的吧。

种植植物 饲养动物 磨制石器 制作陶器

“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早在50年前,毛泽东发表了

著名的《贺新郎·读史》开头写道。毛泽东从文学角度高度概括的这段人类诞生的早期历史,在考古学上叫做旧石器时代。

这个远古时代距今已有二三百万年,人类正是由于发明了制作石质工具的技术,开辟了利用工具获取生存资源的先河,方才脱胎于动物,成为生物进化意义上的“人”。最初,我们的远祖尚处在茹毛饮血阶段,备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生存方式异常艰辛,主要靠采集和狩猎维持生计,仅仅学会了打制石器和用火等。

但到了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的发明和生产步入了快车道,导致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其突出的标志是学会了种植植物、饲养动物、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我们可以把这四项称作是人类最早的四大发明。

那时,人类虽然还采集野果,但已学会了种植植物;尽管还捕获野生动物,但也会了人工驯养动物;他们变打制石器为磨制石器,改进生产工具制作技术;他们第一次发明了合成材料,开始制作陶器以储藏和饮食之用。

自此,人类由过去被动地顺应自然,进入到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较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考古上将这些集群式发明的时代,叫做“农业革命”或“新石器时代革命”。换句话说,没有农业革命为代表的这场充满历史进步的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就没有前面提到的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工业革命。显然,从源流上看,农业革命是源,工业革命是流。

一家之言

前些日子,高考放榜,网上曝出考生为放松心情,集体撕书的新闻。图片中满天飞舞的纸张碎片,映衬着他们解脱后展现的轻松笑脸,的确让人深受感染。先不提撕书行为是否得当,学生们告别苦行僧日子的心情却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世间的事大抵如此,当你瞄准一个目标进发时,会把握在手心的弓拉到最满,等箭中靶心的那一刻,就会全身松懈,安享享受胜利的果实。殊不知,当我们达到预期的目标时,恰恰意味着前方有更高的“靶心”等着我们。

中道也是如此。在我国列入世界遗产的项目中,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加入并不是开天辟地的孤例,在它们之前,已有45项同样具有重大价值的遗产。如果将每一次的中道看作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那么我们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花去的时间竟是27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付出的努力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然而,中道的成功并不是终点站,不能轻易地认为是大功告成的握手言欢,而是需要整装待发的又一次集结!因为,我们知道,去西天取经,看到大雷音寺并不算真经的取得,稍有懈怠,只会落得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结局。

中道成功之后需要更加强有力的保护。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尽管许多文物或风景本身就有较高的知名度,但经“世界遗产”

的桂冠点缀,身价翻番是无疑的了。如此光鲜夺目的光环下,免不了有人会打起发展经济的算盘。以敦煌为例,如今国内外以敦煌有名的品牌有上千个,据说没有一个不赚钱的。而杭州西湖,申遗成功后的第二个“十一”黄金周,旅游总收入就达87.55亿元人民币。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后的10年间,仅门票收入就从125万元增长至7500万元。

文化和经济本不是天敌,掌握好其中的度,完全可以水乳相融,相得益彰。可惜的是,在保护这些世界遗产项目时,我们往往陷入时而“左”时而“右”的漩涡中无力自拔。丽江古城被注入了太浓厚的商业味变得韵味渐无;福建土楼,有的无人问津,一片荒芜,有的开发过度,面目全非,可见,保护之道丝毫不比中道轻松。

再加上,此次入选的两个项目都有其特殊性。过去的世界遗产,大多都是一个具体的点,明确归属于某个地区,而大运河涉及8个省35个城市,“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更是一个跨国的文化遗产。在保护的问题上,如何保证大家的认识是相通的,如何相互协同,避免各自为战等都是首当其冲应该考虑的问题。

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参与方越多,越难保证步调一致。

总之,申遗并不是摆摆花架子的简单走秀,成功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就如一位文物专家所说,世界遗产的保护就像一张图纸画到底,需要长远规划,步步实施,代代相传。

申遗,不是摆花架子

土木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

关于农业革命特别是起源的原因和具体机制,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具体来说,发生于距今一万年前后的人类最早的四大发明,有没有先后关系?究竟是哪一个最先出现?或哪一个出现才导致了另一个再出现?它们是各自发生的?还是连锁产生的呢?这显然是一个考古学上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考古学上有种主要观点认为,远古时代的四大发明是农业生产直接导致的连锁结果。这种观点认为,农业耕种需要一年四季侍弄庄稼,远古时代也不例外。发明了农业种植的人类远古祖先,一般都

强,肉、皮、骨皆可食取,粪便还可肥地的动物,一点点地被圈养起来,成了普遍食用的家畜。

其实在学术界,有人并不赞成上述那样的逻辑或假说,而是认为原始的农业生产不像现代农业那样发达,播种之后,未必一定就会有保障性的收获。因此,人是先学会了定居后,才有了农业或陶器、磨制石器等等手工业生产的。凡此种种,大家对四大发明的原因尤其是农业起源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观点各异,不一而足,非但迄今也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反而出现了更多的诸如天才发明说、气候变化说、人口压力说等各种学术观点。有学者还提出“宴飨说”理论,认为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人类扩大饮食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植物适合做香料和调味品,农业是为了获得享受而产生的。

这几项发明为何同处一个时期

对于人类最早的四大发明,世界各地的多数学者多持正面的认识和积极的评价。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布雷伍德就曾说过:“大约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居民的粮食产量猛增,城市文明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人类的能量一旦解放出来,并且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专门的非农业工艺的发展。”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以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曾获美国普利策奖、英国科普书奖的美国学者雷德·戴蒙德便指出,农业造成了人口膨胀、环境破坏。资源控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战争与屠杀等,他提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

最后要说的,如同近代的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一样,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同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气候变迁、发现发明等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但到底哪个是关键因素呢?我们目前尚不得知,而且我们也不晓得另一个更有趣也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与农业革命相关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四大发明,为什么会几乎同时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而不是其他的时期或年代呢?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炭化的水稻种子



磨制石器